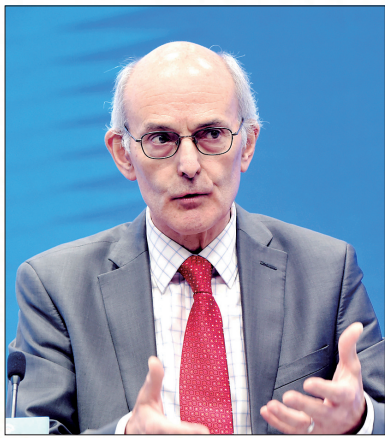


保护古都 讲好“光阴的故事”

第二届世界古都论坛主旨发言摘要(二)

文明是城市的渊藪,城市是文明的坐标。守护遗产、传承文化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核心竞争力。修复文化遗产,能否融入现代元素?考古,思维应该后退,还是超前?古都保护规划,对城市发展究竟有多重要?……在第二届世界古都论坛上,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以“古都保护与城市生活”为主题,针对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进一步做好古都保护工作,讲好“光阴的故事”,让城市文脉得到有效延续,成为大家的共识。

保护文化遗产,要在“过去、现在、未来”中找到平衡点



法国法中文化艺术联合会主席 帕特里克·当布龙

当我们谈到文化遗产的时候,经常会想到“传承”这个词,因为遗产是代代相传的。

说到文化遗产,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它的创造者是谁,或者他创造它的过程是怎样的。拿一座古堡来说,虽然它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去游览一下,看看它的样子,听听发生在它身上的故事,这就是文化遗产的魅力。

有些文化遗产,历经沧桑,就需要用修复的方式更好地保护。在修复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有人支持纳入一些现代元素,也有人认为应该恢复它的原貌,这是一

个崭新的议题。

文化遗产是历史或者生命前进的证据。我想用“三个时间”来阐释我们对文化遗产保护所起到的指导作用。“三个时间”即“现在的过去、现在的现在、现在的未来”,分别表示记忆、直觉、期望。记忆是遗留下来的肖像,直觉是现在对过去的反映,期望是我们考虑现在的物品对未来所产生的价值。保护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要在“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保护和传承好文化遗产,一定要遵循其本身的历史轨迹。

让群众记得历史沧桑、看见岁月留痕



西安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 黄晓华

洛阳和西安都是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古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共同滋养了这两座伟大的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拓展未来的内在动力和宝贵财富。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现代化的和谐共生,成为既现实又紧迫的历史性课题。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西安市已经将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始终以最严格的标准和措施保护历史遗存,使秦汉帝陵明城墙、大小雁塔、钟鼓楼等众多遗产得到妥善保护;将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提高群众生

活质量相结合,使城市文脉得到有效延续,使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同时,我们还充分发挥历史文化资源在城市中的作用,让群众记得历史的沧桑,看见岁月的留痕。

我们将继续保护好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充分彰显城市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

此外,我们在挖掘文化遗产丰富内涵的基础上,还将通过实物、影像等多种方式的展示,让公众看懂文物、走进历史,融入文化,有效形成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

考古的脚步要“有退有进”



哥伦比亚国家博物馆考古馆馆长 弗朗西斯科·罗马诺·戈麦斯

哥伦比亚的历史不像中国的历史那么悠久,但我要介绍的哥伦比亚国家博物馆,即便是放在中国,也称得上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博物馆。

哥伦比亚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其实是一座监狱,它于1874年建成。1945年,当地政府想把它改造成为一个博物馆,4年之后,这个愿望实现了。

起初,我们在这里建设了“记忆和民族”专题展厅,观众能看到各种艺术品、考古收藏品及手工艺品,这些藏品真实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历史。后来,我们实施了“记忆复兴”项目,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

让这里更加光彩夺目。最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内还有一个主题为“塑造社会”的展厅,风格十分独特,更加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对话,尤其是来自不同的领土、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以“展板+声效”的形式呈现。当然,我和我的团队正在努力用更高科技的手段,用更加现代的方式,去打造和展示我们的国家博物馆。

哥伦比亚有一句谚语:“我希望能够非常完整而确定地表达我的意思。”对从事考古工作的我们来说,有时要把脚步适当往后退,有时也需要稍稍超前一些,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当好古都文明的“薪火传人”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金卫东

完善古都保护规划是尤其重要的。保护规划中确定的保护对象、保护范围、保护措施均纳入相应的城镇总体规划、分区规划,特别是落实到所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法定图则中,纳入城市规划管理审批系统,实现全流程管控。

南京市严格控制老城內新增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历史城区、历史地段和老城內重要景观视廊、重要景观节点轴线的建筑高度,并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工作制度,建立“先考古、后用地”的地下文物保护制

度,有力保障了古都特色保护与发展向纵深推进。

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的立法经验,完善法规体系,强化制度刚性执行,加强文物行政执法及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同时,要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对古都遗产保护的支出比重,将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建立稳定增长的机制。

我们一定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先人,切实把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保护好,把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资源传承好,当好古都文明的“薪火传人”。

本报记者 李三旺 智慧/文 张怡照/图

考古发掘六十年 专家共话二里头

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二)

19日至20日,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市召开。来自海内外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二里头遗址及相关问题研究”“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研究”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并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学术交流、观点碰撞。本报选登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有陶范铸造技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煜



二里头文化时期已迈入青铜时代,铜器的数量、种类、规模比龙山文化晚期都有较大发展,冶铸技术也有跃进式的变化,在中国金属技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商周时期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端赖于二里头时期就已形成的原则、工艺、技法。

二里头时期铜器制作技术具有早期铜器制作特征,表现为对铜、锡、铅和砷等合金元素的配比与金属器物的功能关系有一定认识。大部分铜器都经铸造而成,兵器、工具有部分经过热、冷加工。二里头时期青铜器的成形方

法以浑铸为主,目前尚未发现分铸的器物。但此时已经有了陶范铸造技术:按照垂直和水平方向进行分范设计,纹饰的设计沿水平方向展开,在范上制作等。陶范材料具有高粉砂、低黏土、高孔隙率的特点,是用当地黄土淘洗制成的,这种技术为商周时期所承继。因此,可以认为,陶范铸造技术的基本规范和做法,在二里头时期已经形成。

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作坊规模大,延续时间长,浇铸工场、烘烤陶范的陶窑的发现,反映出铸铜工艺设施已有较高的专门化水平。

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已具王都气象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徐昭峰



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面积逾100万平方米,是伊洛地区乃至周边更大区域的中心。二里头遗址已存在东西并列的特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无疑具有了王都的规模和内涵,证明该遗址已具有王都的地位。

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址宫殿建筑的布局演变来看,其宫殿区整体南移。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进入了全面兴盛时期。从空间布局来看,宫殿区居中,北部为祭祀区,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并形成以此为轴线的聚落布局形态,一直持续至二里头文化

四期晚期,奠定了二里头遗址全盛时期的规模。

二里头文化三期,一改二里头文化前期宫殿建筑集中于一处的布局形态,形成东西两个建筑中心。该期在延续二期大的空间结构基础上,最终完善了二里头都城遗址的宫城空间结构。

至二里头文化四期,三期形成的聚落布局和宫城布局基本未发生大变化,持续着三期以来的繁荣。与考古界之前的认识不同,二里头遗址在其四期并未处于衰落阶段,而是仍然处于繁荣阶段,其性质仍属于都邑。

二里头铜牌饰是夏代建旗制度的有力物证

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副教授 胡建升



二里头铜牌上的神熊形象直接传承了古老的神话记忆与大传统文化编码,夏代历法直接继承了远古以神熊为符号编码的自然历法。

在出土文献《容成氏》中,夏禹建五方旗,熊旗居中,成为了夏代政治旗帜制度与国家信仰的中心标志符号,也成为夏代政治制度、政治权力与国家形象最为合法、最具权威的神话图像。二里头铜牌饰出土时正好在人体中心的胸腹部位置,也为神熊居中的夏代建旗制度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图像证据。

在传世文献中,夏代君王具有化熊的记载,体现了夏代君王与神熊有着共同的神话认同,这种神话认同充分体现了远古神熊的神话信仰在夏代君王身份方面的文化记忆与具体表现。

二里头铜牌饰上的神熊形象与夏代历法制度、建旗制度及化熊故事都保留相同文化结构的神话幻想与原型编码,即都依据熊的自然生态与天熊存在来制定现实历法制度、政治制度与礼法制度。二里头铜牌饰为我们重新思考和考辨夏史提供了全新的物质证据。

二里头酒礼器开启中原礼制新变革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 豆海峰



二里头时代是中原地区社会组织、礼仪制度、生产技术、器用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代奠定了中国早期国家发展的基础。

在礼器制度方面,以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特有的酒器作为基本组合形式的器用制度,开启了中原地区礼制的新变革,对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影响深远。

结合以往的研究,可以确定二里头文化酒器组合的演变特征,从等级、技术、使用程序等方面解析二里头遗址中酒器组合的制度化

与规范化过程;也能从微观层面探讨二里头文化所见酒礼器产生与发展的动因。通过对爵、盃、爵、觚、斝等器形态和功能分析可以看出,此类酒器是在继承本地已有器形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而产生的;以酒器随葬并赋予“礼仪”的功能则是对“东方”地区礼制传统的借鉴与吸收。从宏观区域互动角度对二里头文化酒礼器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具有秩序性、等级性的酒礼器对中原以外地区有着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本报记者 孟山/文 本报记者 刘冰/图